

# 毛泽东体育思想形成的理论来源

姚绪忠<sup>1</sup> 秦正为<sup>2</sup>

(1.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 山东聊城 252059; 2. 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山东聊城 252059)

**摘要:** 采用历史分析法探讨毛泽东体育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结论: 毛泽东体育思想形成的理论来源包括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中国传统体育思想和中国近代体育思想。其中, 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是毛泽东体育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 中国传统体育思想是毛泽东体育思想的文化基础; 中国近代体育思想是毛泽东体育思想形成的现实参考。

**关键词:** 体育管理; 体育思想; 毛泽东; 理论来源

毛泽东体育思想博大精深, 它不仅是中国体育史的宝贵财富, 也是当代及今后指导我国体育发展的理论基础。在新形势下, 认真研究毛泽东体育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 而且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与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一样, 毛泽东体育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现实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因而, 毛泽东体育思想的理论来源既包括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 也包括中国传统体育思想、中国近代体育思想。

## 1 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是毛泽东体育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

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的形成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经典作家的体育理论与实践密不可分。

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就非常喜欢各种体育活动, 如击剑、游泳、骑马、下棋、打牌、爬山和散步等, 在某些方面还是高

手, 并且他们对体育的爱好一直坚持到晚年。“有健全的身体, 才有健全的精神”, 这是马克思非常欣赏的一句名言, 也是他喜欢体育的重要原因。不仅如此, 马克思、恩格斯还对体育运动做出了许多精辟的论述。如, 他们抨击资本主义的罪恶, 认为“为资本家进行的强制劳动, 不仅夺去了儿童游戏的时间, 而且夺去了家庭本身通常需要的、在家庭范围内从事自由劳动的时间。”<sup>[1]</sup> 马克思认为, 体育同体力劳动相结合, 是促进少年儿童智力发展和身心健康的首要途径, 强调在紧张的生产劳动中, 要把体育锻炼作为保证少年儿童健康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我们把教育理解为三件事: 第一: 智育; 第二: 体育; 第三: 技术教育……”<sup>[2]</sup> 他们还要求把体育和军事训练结合起来, 因为一些国家的军队之所以有高度的灵敏、良好的素质、顽强的意志, 是由于这些军队重视体育训练。“如果说雅典人普遍的体育训练是锻炼和增强体力并重, 那么斯巴达人则是着重增强军人的体力、培养坚忍不拔的性格和吃苦耐劳的精神。”<sup>[3]</sup> 正是在此意义上,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促进青少年参与体育锻炼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非

**基金项目:** 教育部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11YJC710042); 山东省人文社科强化建设基地项目 (MJDXK0103)

**第1作者简介:** 姚绪忠 (1970-), 男, 山东东阿人。硕士, 研究方向为体育文化与体育思想。

Tel: 13969571615, E-mail: qinzhw@sina.com。

常重要,“对男性青年一代实施体育和军事的训练”是“向新制度过渡的重要条件”<sup>[4]</sup>。

与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列宁也非常喜欢体育运动,他经常参加的体育活动有体操、弈棋、散步、狩猎、登山、游泳、划船、钓鱼、滑冰、滑雪等十多个项目,甚至是许多项目的行家里手。同列宁共同战斗多年的老布尔什维克巴戈茨基说道:“任何一个人如果看到这位拥有青年人朝气的热情滑冰能手,看着他在冰面上做出各式各样十分优美的动作,你们绝对不会想到他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在被流放西伯利亚期间也十分注重自身的体育锻炼,他每天坚持散步,一走就是几十公里。他认为,作为一个革命家,首先要具有一个好的体魄,拥有吃苦耐劳的毅力,要经得起磨难。同样,列宁也给后人留下很多宝贵的体育思想。比如,他曾经高度评价体育的地位和作用,指出:“体育运动是苏维埃国家的成就、繁荣和兴盛的标志之一”。他还高度评价体育活动与工作的关系——“谁不会休息,谁就不会工作”,这是列宁的一句名言,也是列宁在紧张艰苦的革命环境中保持健壮身体和昂扬斗志的秘诀所在。列宁还主张体育工作与卫生保健相结合等等。

毛泽东在继承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革命和建设理论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关注、思考他们的体育理论与实践。可以说,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和基本内核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体育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基本内核也是马克思主义体育思想。毛泽东是继承了他们的体育思想并通过自己的实践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 2 中国传统体育思想是毛泽东体育思想的文化基础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具备孕育和发展体育运动的基本条件。无论是戈壁荒漠、平原草地,还是江河湖泊、高原山地,无论是安居乐业、清平世界,还是移居流离、战乱年代,广袤的中国大地上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体育文化。在原始社会人与自然斗争的渔猎、采集、生产等活动中诞生了具有东方特色的中国古代体育。早在原始社会末期,我国就产生了治病保健的“大舞”。射箭既是远古的打猎工具、战争武器,也是较早的

竞技项目。传说夏代已有学校习射。殷商出现了习武教学比较系统的学校。周代六艺教育中有射御(射箭、驾车),每年都照例举行一次规模盛大的“运动会”。春秋时期,乡射礼已经成为较为规范的体育比赛运动。战国时期临淄的“蹴鞠”是最原始的足球运动,非常流行。自汉代到明清各种形式的体育活动不可胜数。我国古代的体育项目绝大多数都是军事能力的衍生品,例如射箭、武艺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是供贵族娱乐的,例如龙舟、风筝等;由于体育本身具有多种社会功能,其性质一开始就不是单一的,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又根据不同时代的需求得以发展,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化。在这特有的地理环境和传统文化基础上,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具有独特的内涵和表现形式:重视内圣外王,通过修齐治平,成己成物;重视精神建设,忽视肉体建设,在很大程度上“重文轻武”;重视“意念”养生,通过静坐或运动实现“天人合一”、祛病健体;重视中庸和谐,多模仿动物运动,以圆形、向心为主,强调小肌肉群、小关节参与活动的完成;竞技运动讲求“礼”“和”,个人不重争斗,团体重在统一等等。

毛泽东自幼就“熟读经书”,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并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颇深,在以后的岁月里,他特别喜欢研究中国古代文史典籍。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颜李学派的体育思想,不可避免地为毛泽东所批判继承、创新发展。颜李学派是指以颜元(1635-1704)及其学生李塨(1659-1733)为代表的对程朱理学进行激烈批判、具有早期启蒙思想的学术派别。颜李学派教育思想的显著特点是坚持德、智、体“三位合一”的原则,力主“身心、道艺一致”,以培养担荷圣道、经世致用、匡时救世的人才。梁启超认为,颜元是中国两千多年来第一个明确提倡体育的教育家。青年毛泽东颇受颜李学派的影响。他说,古人把智、仁、勇三者并称为三达德,现在的教育者则倡导德、智、体共同发展<sup>[5]</sup>。在《体育之研究》中,毛泽东对颜元“文武缺一岂道乎”的观点尤为赞赏,对颜元重视体育的思想予以继承并进行了充分发挥。毛泽东认为,“贵乎动”体现了人的原始本性,体育的功效在于“强筋骨,

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三育中，“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所以，毛泽东认为在“德智体”三者中，体育应该居首位，只有身体强健后才有能力学习知识和提高道德修养。

颜李学派的观点深深影响了毛泽东的体育思想，原因在于，一方面，毛泽东与颜李学派生活时代类似，均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经世之学得以前受重视和重用；另一方面，毛泽东与颜李学派有着特殊的地缘关系。颜李学派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为曾国藩、梁启超所继承，而毛泽东早年对曾、梁非常敬仰，在深研二人著作的过程中得以注意到颜李学派的学术思想。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广泛地接触到了清初几位大师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和颜元的著作，对颜元、李塨的习行哲学尤为欣赏，屡加称述。在《体育之研究》中，毛泽东对颜元（习斋）、李塨（刚主）“文而兼武”、顾炎武“不喜乘船而喜乘马”甚为服膺，说“此数古人者，皆可师者也”。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者，毛泽东在接受、学习、研究、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也继承、发展和弘扬了中国传统体育思想。可以说，毛泽东思想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其体育思想也是以中国传统体育思想为基础的。毛泽东是在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体育思想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彰显了传统体育文化的生命力。

### 3 中国近代体育思想是毛泽东体育思想形成的现实参考

近代中国是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阶段，也是中西方思想相互交锋碰撞、交汇激荡的时代。在此过程中，中西方的体育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得到传播和发展。

鸦片战争后，随着大量传教士进入中国，教会学校迅速发展。当时的教会学校一般没有体育课程，但是却开展极为丰富的课外体育活动。这些体育活动主要有田径和球类活动，球类主要包括棒球、足球、网球、篮球、排球等。教会学校的体育活动，是西方田径和球类运动传入我国的主要途径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基督教青年会在近代中国体育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基督教

青年会很重视体育活动，并设有体育部，不但从美国带来了如篮球等大量的近代体育项目，而且很重视体育理论的传授。他们经常组织体育比赛，极大地带动了我国学校体育活动的开展，并培养了大量的体育专业人员，有一部分人成为了我国著名的体育家。随着教会学校在中国的发展，美国的自然体育思想也传入我国，五四运动中逐渐被人们接受并成为民国时期的主要体育思想。总体来讲，自然体育是在注重人性的基础上，对学生进行符合自然生长规律、兴趣、心理和生理需要的科学的体育活动，以达到教育学生的目的。

在此影响下，中国政府和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重视体育。洋务派创立了大量的军事学堂，除开设一些近代军事学科外，还设有体育课程，称为体操课。在维新运动中，清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开展学校体育的规章制度。维新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是维新派的体育思想却对之后的体育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并在学校教育中设置体操课程，中国学校教育中从此正式有了体育。辛亥革命后，军国民教育一度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教育思想。早期的蔡元培就崇尚尚武精神、重视体育，辛亥革命后他担任第一任教育总长后，更加提倡军国民教育，军国民教育就是体育、认为体育具有增强体质、培养意志品质和美育的作用，是学校教育不可缺少的部分；利用体育使得全民皆兵，既可以抵抗帝国主义侵略也可以抵制军阀专政。此后任教育总长的范源濂也积极主张军国民教育，提出：“诚以充实国力之最良制度，莫如全国皆兵”。在此过程中，随着复古思想的此起彼伏，也出现了所谓“国粹体育”。当时安福系军阀马良，用武术操的形式创编了一套“中华新武术”，把它说成是我国的国粹，受到军阀和国粹派教育家的支持。1918年，第4次全国教育联合会以及中学和专门学校校长会议决议，把武术列入中等以上学校的体操课程。新武术得到了孙中山、蔡元培等人的提倡，北洋军阀政府将其定义为“中国式体操”，国民政府时期武术则被视为中国的“国术”。发展体育、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的时代风潮，这对毛泽东体育思想有着巨大的影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毛泽东体育思想的形



成过程中,曾国藩、杨昌济、蔡元培、陈独秀、泡尔生等人的体育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

曾国藩(1811-1872),湖南湘乡人,晚清重臣,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得益于独特的地缘关系,毛泽东对曾国藩甚为熟悉,对“经世致用、敢为人先”的湖湘文化深为赞同,毛泽东曾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sup>[6]</sup>。在《体育之研究》中,毛泽东也引证说:“曾文正行临睡洗脚、食后千步之法,得益不少。”

杨昌济(1871-1920),湖南长沙人,著名教育家,杨开慧之父,毛泽东最为佩服的老师。杨昌济一贯主张德智体“三育并举”、“身心并完”,教育学生要加强体格和意志的锻炼,要“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同时,杨昌济还身体力行,长期坚持静坐、冷水浴、长途步行等体育锻炼方法。毛泽东的许多思想和行为习惯都深受杨昌济的影响。正是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毛泽东产生了从事体育理论研究和著述的念头,并得到了杨昌济的赞同。也正是在杨昌济的帮助和直接润色加工下,毛泽东写出了具有代表性的《体育之研究》。

陈独秀(1879-1942),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和早期最高领导,曾被毛泽东称为“我们这一代人的老师”。陈独秀非常注重体育,1915年他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中曾专节论述中华民族的体格培养和体育价值。特别是陈独秀“意志顽狠”、“体魄强健”的“兽性主义”对青年毛泽东影响极大,《体育之研究》中的“野蛮其体魄”实际上就是对这种“兽性主义”的具体发挥。美国著名体育思想研究权威J.M.Hoberman称陈独秀的“这篇文论是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的范本”<sup>[7]</sup>。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就是经杨昌济推荐给《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最终在《新青年》杂志的第三卷第二号上发表的。

泡尔生(1846-1908),与尼采同为德国意志哲学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伦理学原理》由杨昌济带回国译出,并由蔡元培作序出版。毛泽东

在写作《体育之研究》之前曾认真研读全书,并做了万言书批,成为其早年思想,特别是体育思想的重要组成。泡尔生的思想集中体现了一种“意志主义”。在万言批语中,毛泽东把“野蛮其体魄”和“意志主义”的思想发挥到了极点。美国历史学家Wakeman在其名著《历史与意志》(History and will)一书中这样总结到泡尔生对毛泽东的影响,他说,泡尔生能够影响毛泽东思想,因为他使毛泽东具备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理性<sup>[7]</sup>。

近代中国的体育思想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历史现状,也反映了近代中国的时代诉求。中国落后挨打,中国人民亟需改变现状,而向由落后国家变为强国的日本、德国学习便成为一条重要途径。反映在体育思想上,陈独秀的“兽性主义”直接来源于日本思想启蒙家福泽谕吉(1835-1901),泡尔生的“意志主义”曾经是德国哲学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些都对毛泽东的体育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是近代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产物,而毛泽东的体育思想也正是近代中国历史现状和未来诉求的典型代表和缩影。因此,中国近代体育思想是毛泽东体育思想形成的现实参考。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33.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218.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12.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436.
- [5] 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47.
- [6] 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85.
- [7] J.M.Hoberman. Sport and political ideology[M]. Heinemann, 1984: 220,221.